華夏文明之光

HUA XIA WEN MING ZHI GUANG



殷光熹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楚骚：华夏文明之光

殷光熹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　抗
封面设计：王仲德
责任校对：段建堂

楚骚：华夏文明之光

殷光熹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陆军学院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52千
1990年 10月第 1版　1990年 10月第 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81025-067-1/I·6　定价：2.95元

前　言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进入了文人自觉创作的时代。屈原既是“骚体”诗的创始人，也是我国第一个写长篇抒情诗的文人诗人。他的爱国思想、远大抱负、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历来为人们崇敬。两千多年来，“屈原精神”一直激励着、感染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不断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导演出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史新场面；多如繁星的历代作家，纷纷追踪屈子遗迹，重奏楚骚遗响，谱写出众多优秀诗篇，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学者对《楚辞》的研究，相继不断，成绩卓著，以致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可见，屈骚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是难以估量的。记得业师姜亮夫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要是没有屈原的作品，就不会有我们后代文学这个发展，或者说我们后代文学的发展不会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子，象汉乐府、唐人律诗、宋以后的词曲等，可能是另外一个路子。至于什么路子就无法猜了。”（《楚辞今绎讲录》）更令人鼓舞的是，屈原的影响已扩大到全球，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他的作品已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屈原和《楚辞》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华民族为有这样一位伟大诗人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马茂元教授在《楚辞研究集成·总序》中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任何研究工作都有它的继承性、连续性。前人步武的终极，应该是后继者发轫的起点。这样才能推动这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清理、吸收和参考前人以及近代学者的学术成果，去粗取精，从而使自己更进一步向新的目标迈进，对于研究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对屈原及《楚辞》的研究，自应东过去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段话既对楚辞研究工作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对开创楚辞研究新局面寄予了殷切期望。可以说，这个“新局面”已开始出现，仅就近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以来）国内楚辞研究情况来看，成果累累，形势十分喜人！在这一时期中，学术研究的活跃气氛又重新激发了我对楚辞研究的积极性，然而当我着手选题时，却遇到了困难：第一、楚辞研究的历史悠久，积累了许多成果，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许多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几乎都有人论证过；至于聚讼纷纭的“老大难”问题，就象是一块块“硬骨头”，少有人去碰它。第二、有关屈骚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目前，在先秦时期典籍中尚未发现；两汉时期有一些，但不多；唐以后至近现代，后人研究楚辞的论著又非常多，一般图书馆就连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也难收齐，更不要说把它们收全了。第三、楚辞研究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国学根底，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这就是说，已基本具备的条件还需要巩固、提高、深化；薄弱环节、不足之处需要补课、钻研，或请教师长，或与友人研讨。总之，就个人研究楚辞的条件而言，受到诸多限制。好在有师友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一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七九年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主办的楚辞进修班，我有机会被选送到姜亮夫教授门下受业，获益匪浅。回云大后，我即用部分精力研究楚辞，并且给研究生开了专题研究课。

在治学上，我赞成“在务实的基础上创新”。尽管做起来有困难，我还是努力去实践，例如先从基础工作做起，认真阅读《楚辞》原著，参读各种注本，写出心得体会；在此基础上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和古今学者论著，经过反复酝酿、构思，然后选定题目。或考察辨析，去伪存真，有所发明；或抓住关键问题，层层剥笋，有所开掘；或突出重点，加强论证；或系统论述，比较分析，形成系列；或全面追溯，阐幽探微。其间如有同于旧说者，也尽己所能，进行补充、阐发和论证；如有不同看法，力求中肯、公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如遇疑而不明的问题，多方求证，使不太明朗的问题得到回答；如有新说，力图将理由阐述清楚，具有说服力。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主观愿望和追求，有待实践的检验。

本书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对屈原思想的研究；二是探讨楚辞本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三是“二招”（《招魂》、《大招》）专题研究；四是论述唐以前楚辞研究史；五是楚辞的“影响”研究。当然，上述内容的研究，范围很广，只能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即便如此，也并非说本书已经达到预定目标，今后还有许多事可做。

本书虽不是我研究楚辞的全部，但多少反映我在楚辞研究上的情况。一芥书生，虽不足道，然报国之心眷眷于怀，特以此微薄之礼献之，此其一；二来想向前辈师长作个汇

报，乞望指教，三来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

事业艰辛，冷暖自知。值此全书竣事之际，铺纸磨墨，姑写记之。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

目　　录

前　言 ——（1）

屈原思想流派辨 ——（1）

楚辞在艺术形式上的地方特色 ——（17）

楚辞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 ——（33）

《招魂》探 ——（50）

《大招》探 ——（69）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论 ——（10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115）

试论屈赋对辛词的影响 ——（131）
—论屈赋与辛词（之一）

辛词中回荡着骚人的灵魂 ——（147）
—论层赋与辛词（之二）

骚人的审美情趣 ——（160）
—论屈赋与辛词（之三）

从表现手法上看辛词与屈骚的关系 ——（174）
—论屈贼与辛词（之四）

继承屈原精神，重奏楚骚遗响——（191）
——从南宋词作和楚辞研究看屈原的影响
屈原与鲁迅——（205）
后　记——（21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屈 原 思 想 流 派 辨

屈原思想到底属于哪一家？历来研究楚辞的人看法不一。较普遍的看法有三种：儒家、法家、道家。此外还有认为属于阴阳家、神仙家或杂家的。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和例证。如果从屈原与先秦诸子思想的相互影响来说，这些看法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某个思想体系看，硬派屈原的思想为某一家、某一思想体系，就值得商量了。因为用北方先秦诸子某个思想流派的框框来套屈原的思想，不仅不符合屈原的思想实际，也是不科学的。究竟怎样看待屈原的思想才合乎实际、合乎科学？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关于屈原思想是否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问题

认为屈原思想属于儒家一派的，最早从刘安开始。他在《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是用儒家的道德观来看屈原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东汉王逸首先系统注释《楚辞》，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①”，以儒家的眼光来读《楚辞》、注《楚辞》。在他的注释下，屈原成了儒家信徒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

把屈原同“大儒荀卿”并称。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刘勰没有完全苟同王逸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辨骚》一文中指出有四点“同于风雅”，有四点“异乎经典”，即使不象彻底的儒家，也有一半象儒家。其他如韩愈、柳宗元、贾岛、王世贞等都曾论及屈原思想，想把屈原的作品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给屈原戴上儒家桂冠，披上经典外衣。到了现代，也有人认为屈原思想属于儒家范畴。

应当承认，屈原的思想中有儒家学说影响的成份，但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他并不属于儒家一派。

一、从政治思想看，同是称道尧舜禹汤文武，但内涵不同

各家借先王之道来为自己的学说张目。

先秦诸子，为了给自己的学说找到历史根据，都打着先王的旗号，穿戴着尧舜禹汤文武的古衣古冠来谈他们的理想。从形式上看，服装越穿越古；从内容上看，则越讲越近。他们所说的先王，虽然都是尧舜汤武，但各有各的涵义，正如韩非指出的那样：“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②他们都称道尧舜，但有区别，有是非，亦如庄子指出的：“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③

儒家虽然称道尧舜，但因为夏、殷之礼不足征，所以重在周道。儒家宣扬先王之道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先王的形式中装进改良的新内容，以便调和阶级矛盾，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④。由此看出，儒家的理想并非全系空想，还是有其现实目的的。

墨子也称道先王，但与儒家不同。他抬出先王作为理想的标志，乃是为他的“尚贤”、“兼爱”、“非礼”等张目的。他理想中的先王，是按照他的学说设计出来的。例如他反对礼，根据是“圣王不为礼”；反对乐，根据是“圣王不为乐”。他主张“兼爱”，就列举“先圣大王”禹、汤、文、武等人实行兼爱的故事⑤。他的标准是：“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这些话，看起来好象是效法先王，实质上不过是让先王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

道家也称道先王，不过这些先王都是舜以前的人物。在道家看来，儒墨之争，与尧舜有关，如果抬出更古的奇谈人物，也许就不会有麻烦了！因为无籍可征，无史可查。

法家虽然反对法先王，对言必称尧舜者，斥为“非愚则诬”，但他们也借先王的理想之治来为自己的主张立论。《韩非子·说疑》云：“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縲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民尊。”这是从先王的历史中找出不别亲疏、不分贵贱的论据，是为当时变革时代的要求而发的。

屈原与上述各家称道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的内容是不同的。他称道先王是赋予了自己所设计的特定内容，这就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⑦，要向统一中国的尧舜禹汤文武追赶上去。产生这种政治理想，有其社会的、历

史的根源。

中国原始社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大小氏族集团的联盟。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氏族联盟逐渐趋于瓦解，但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形式。从殷周以来，许多氏族集团逐渐变为春秋十二侯，再演变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必须统一。屈原是感到这种时代脉搏的跳动的，因而产生了由楚国担负统一中国重任的政治理想。屈原称道远古时期的先王，实际上是按照当代人的想法塑造出来的楷模。

主张要象尧舜等先王那样“举贤授能”。屈原列举了许多国君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而举贤授能的故事。除了尧舜让贤的故事外，还有汤武任用挚、咎繇,殷王武丁任用筑墙奴隶傅说，周文王任用屠户出身的吕望，齐桓公任用饭牛人宁戚等。屈原的“举贤授能”主张，既与当时的政治形式颇有关系，又与远古尧舜禅让的传说影响有关。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现实，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希望有一个道德完美的国君出来统一天下。在他们的想象中，如果天子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做天子的人一定是贤人。这样的天子一定会选用人才，并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做到民归政显。屈原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但他所称道的尧舜禹汤政治，与儒家的不同。他所说的尧舜只是“耿介”、“遵道”⑧而已，并不象儒家把尧舜禹汤粉饰得很庄严，夸大得高不可攀。例如《论语》中孔子就说过这样的话：“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德如天，其智如神”等。在屈原心目中的夏、商、周，仅仅是“汤禹俨而祇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并不象儒家所说的那样了不起：“禹吾无间然矣”⑨、

“文王既殁，文不在此乎！”⑩

二、从天道观方面看，儒家是相信“天命”的

孔子就自称“天生德于予” ⑪。孟子认为“舜有天下”是“天与之”的⑫。屈原则持怀疑态度。他在《天问》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天命的怀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上天对好人是如此的无情，对坏人又如此的庇护，天命何可信？天道又何在？“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这是对天授王权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屈原从怀疑天命到否认天命的朴素唯物观，与儒家天道观是截然不同的。

三、在社会问题方面，儒家重周道，讲仁义

屈原也讲过周道，但仅仅是“论周道而莫差”，不像孔子那样把周道说得完美至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⑬“周公其盛矣乎!”⑭屈原比儒家所称道的先王先公大圣大贤还要求高些。在他看来，尧舜禹仅仅是正直耿介、遵道而行，还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究竟什么东西才是他寻求的真正境界，他还在“上下求索”，既到现实生活中去“求索”，也到海阔天空去“求索”。但是 ，在当时他是无法找到真正合乎要求的社会理想的。

四、从对待人民的态度看

屈原要求统治者做贤明君主，改良政治，爱护人民。这与儒家的讲仁义还不同。儒家要求统治者讲仁义，不过是减轻人民负担，不象屈原那样要求君王保护人民。儒家轻视人

民，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⑯。屈原热爱人民，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倾听人民的呼声，传达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五、从处世态度和从政态度来看

儒家是“不得罪于巨室”，要求不要同贵族对抗。所谓“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或者是“反复之而不听则去”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⑱。屈原就不是这样。他坚持原则，决不屈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专门与那些贵族保守势力作对。对于国君，直言死谏，明知会惹祸，但是责任感使他不能不这样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儒家的处世态度是先个人后国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⑲。而屈原是“专惟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仇”，“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⑳。

六、在历史观方面，屈原与儒家的经典传说更是不同

（一）儒家把尧舜放在夏殷之前，屈原把尧舜放在夏殷之间，不放在夏之前，这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因为《诗经》中有若干处提到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提到禹的地方有若干处（后出的几篇除外），但唯独尧舜名不曾一见。由此可见，尧舜禹的传说，禹先有，尧舜是后起的。屈原之所以把尧舜放在夏殷之间，是因为舜（帝俊）是殷家先祖。

（二）儒家对历史的态度是 远不说近，或者详远略近。孔子作《春秋》就是典型的例子。《公羊传》是这样说的：“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休的“注”说得更为明确：“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儒家编撰历史有自己的一套褒贬标准，既然要“明哲保身”，当然就要“为亲者讳”了，否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㉑的话就不会出自孔子的口了。屈原则相反，对夏商两朝的历代君王，除桀以外，指责的极少。到了周代，对文王略有微词；对武王就很不客气了：“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对周公旦也提出了质问：“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接着对周昭王、周穆王等历代君王进行指责：“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挴，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最令人敬佩的是屈原敢于触及到春秋时代的楚国的历史人物身上，对自己的先君先臣大不敬：“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㉒所有这些，与《离骚》、《九章》中昏君党人的大胆抨击与揭露的精神是互为表里的。这与儒家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大相径庭，难怪班固批评他不能“明哲保身”㉓，颜之推责备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㉔.

（三）儒家说鲧是“方命圮族”（违命败族），治水九年都没有成功，而被处以殛刑。屈原却为鲧鸣不平，在《天问》中为其翻案，说鲧是“顺欲成功”，是“𡧓直忘身”（倔强遭害）。

（四)儒家经典说舜是个鳏夫,尧把二女嫁给了舜。借此从道德上抬高尧舜。屈原却以另外的传说证明：“舜闵在家，夫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㉕不同意“有鳏在下”（舜是鳏夫）的说法。同时指出：尧为了延续其后代，还是将二女强行嫁给了有妇之夫的舜。

（五）儒家把夏启说成是“贤君”，例如孟子就说过：“启贤”，“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㉖。但在屈原看来，启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屈原在《天问》里又说：“启代益作后。”传贤变成传子是从启开的头。是不是屈原对启代益（破坏了让贤制）有看法呢？

（六）以儒家正统人物的眼光来看屈原作品的人，也认为屈原思想不属于儒家思想体系。刘勰说他的作品有四点不合乎经典：诡异、谲怪、狷狭、荒淫。朱熹说屈原不能“中庸”，因而“不可以为法”，说他的作品“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说他“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以故醇儒庄士或羞 称 之”㉗。这些说法就道出了真实情况，说明他们的正统眼光还是敏锐的，确乎不象某些学者那样，硬派屈原为儒家。

（七）儒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屈原则不然。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运用浪漫主义手法驰骋想象，上天下地，登山涉水，神仙鬼怪，草木鸟兽，纵笔描绘，把儒家忌讳的一切东西都活生生、赤裸裸地摆了出来。儒家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乐而不淫”等诗教及不谈鬼神等禁忌，对屈原来说是无效的。屈原大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而创作的诗篇，在儒家看来是越轨的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